上海:红色中华的孕育地

朱少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诞生。鲜为人知的是,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许多筹备工作都在上海秘密进行。

中共六大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尤其是曾受大革命影响比较深的湘、鄂、赣、闽、粤、皖等地,革命形势趋于高涨。此时,中共中央已从武汉迁回申城。1929年秋,身负特殊使命的林育南化名“赵玉卿”,在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一幢洋房(原建筑已不存)设立秘密机关,对外称为“赵公馆”。

1930年5月5日至10日,“赵公馆”布置得一派喜气,聚集着不少给老人拜寿的“客人”。实际上,他们都是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同志。在预备会议中,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正式会议审定的各项决议草案,并为正式会议作了具体准备。其间,虽曾有“包打听”(密探)骚扰,但因林育南预先对会场作了掩护,丝毫未露出破绽。

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新中国成立后更名长江剧场)旁边的一座4层楼房(原建筑已不存)开幕,与会代表约50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各赤色工会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会议期间,未到会的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等10人,被推举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由项英、周恩来、李立三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宣布了全国苏维埃政府的十大政纲,决定于本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讨论通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等,并决定设立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领导“一苏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共中央特科严密守护,直至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顺利结束,租界警探才发现会场位置,但早已人去楼空。

7月23日,由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革命互济总会、上海总工会、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代表组成的“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在沪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工作计划大纲等,确定了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由李求实担任党团书记,林育南担任秘书长,工作人员有张文秋、彭砚耕、李平心、胡毓秀、冯铿等;机关设于上海愚园路庆云里31号(原建筑已不存),这是林育南以化名“李敬塘”租下的一幢3层石库门房屋。

“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系列法令草案。“中准会”曾编印《中国苏维埃》,并在为出版这种重要文献集撰写的《引言》中指出:“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是全国几万万工农兵贫民群众当前最迫切最基本的任务。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在这一伟大任务之下,受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委托,严肃的努力于历史的新时代之创造的工作。”

林育南与一些同志在庆云里常挑灯夜战。这天中午,一位老板模样的人走进来,问这里有无空房出租;“李老板”客气地寒暄,回答得滴水不漏。“哈哈,好一个‘李老板!’”老板模样的人拿下墨镜、扯掉假胡子说,“林育南同志,你的警惕性很高,这里确实比较安全呀!”林育南这才发现,站在面前的竟是在沪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此后,这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又多次前来指导工作。

9月12日,“中准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鉴于准备工作尚不够充分,决定把原计划于本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一苏大”日期推迟,并改在中央苏区举行。

12月初,“中准会”工作已告一段落,林育南前往中央苏区继续参与筹备“一苏大”,但因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此行受阻,他被迫重返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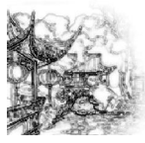
翌年1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和左翼作家被捕,很快转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中有林育南、李求实、彭砚耕、冯铿等;2月7日,“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为此,“中准会”临时常委会机关不得不离开庆云里。

最终,“中准会”临时常委会组织完成的一批法律文件草案被完整地送到中央苏区。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些法律文件草案被审议通过,对苏维埃政权建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时,笔者寻访当年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中准会”临时常委会机关遗址,心潮澎湃:上海不仅是党的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驻地,也是红色中华的孕育地!

想起周小燕看“世界杯”

马信芳



灯下偶拾

本届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激。电视机前的新老球迷们大呼“哈亚!”这让我想起声乐教育家周小燕教授生前观看世界杯的往事。周先生是教音乐的,足球原先与她“不搭界”,而2006年世界杯一场足球赛竟把这位音乐家吸引住了。

这是2010年,高兴的是,周先生答应了我的采访要求。那天,我来到复兴中路明园小区里她的家。我们说好访谈一小时,没想到一谈竟是三小时,还意犹未尽,急得保姆阿姨出来打“招呼”。阿姨告诉我,周老师虽然在家里为研究生上课,其实她很累,别看她上课时精神十足,学生一走,常常瘫倒在沙发上。所以,学院、市里有关领导都要她管好周老师,特别是周老师的休息。

我问:“周老师听你吗?”

阿姨:“当然听的。因为她知道,不休息,怎么能上好课？所以每天午睡是必须的。但晚上我控制不住她。那些天‘世界杯’,周老师看得津津有味,却让我担心。”

原来周先生看足球赛是从2006年第18届世界杯足球赛开始的。她记忆犹新的是那场在德国进行的法国与意大利的决赛。全场表现异常出色的法国队队长齐达内却在加时赛的最后10分钟用头冲撞了对方的马特拉齐而吃了红牌,这导致整个球队的被动和心态的失衡,最后点球落败,意大利队夺冠。

周先生告诉我,事后,有人说这个队长是由于受到对手挑衅才情绪失控。但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太可惜了。周先生感慨地说,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很容易被人激怒,做出一些令自己事后悔恨不已的事。其实,冲动是一种最无力,也最具破坏性的情绪,它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话题回到了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我问道:“看今年的‘世界杯’,你又有什么体会?”周先生爽快地答道:“我看到了‘团队精神’!”

那场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进行的决赛,最终,荷兰队与西班牙队在90分钟里0:0战平。在加时赛下半场116分钟时,西班牙中场球员安德烈斯·伊涅斯塔在禁区内攻入制胜的一球,让球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

周先生说,你看,要让这小小足球“进门”,多不容易！前锋、中锋、边锋、后卫,还有守门的,一个个必须密切配合。谁要出风头,耍动作,那就甭想赢。西班牙队与荷兰队的队员们配合得都很好,所以,100多分钟里,双方都没能进球。最后,虽然一球定乾坤,但在我眼里,两个队都是赢家。这与我们搞艺术的太像了。如我们的一台歌剧,编、导、演、舞美、灯光,一样不可缺,而且必须协作配合。这就是“团队作战”。哪个人想出风头,那整台戏非砸了不可。

我知道,周小燕先生曾为“团队要旨”大声疾呼,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和学院领导十分重视她的意见。由此她的“团队思想”大大发扬:周小燕的教学获得了精品奖,她所在的声乐系被评为“国家级声乐团队”……

不过,周先生说,看球赛也要注意,特别是我们老年人,晚上10点后我是不看的。精彩的,我会看第二天的重播。说到这里,她哈哈大笑:“你说,我也算个球迷吗?”

往事悠悠

影后之孙来沪看祖母旧照

孙孟英

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明星的美照,我是情有独钟,这并非“钟情”于她们的美色,而是钟情于她们高超演技和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在那么多的女明星中,我最钟情影后胡蝶,缘自15年前王开照相馆发现电影明星胡蝶的不少老照片,以及之后和胡蝶孙子潘先生的一次相聚。

那是2007年1月29日的下午2点左右,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健壮,身穿一件灰色风衣的年轻男子带着疲惫的神态风尘仆仆地来到“王开”要见我。他走进办公室自我介绍是胡蝶的孙子,让我叫他小潘！我当时先愣了一下,随后感到喜出望外,竟然是胡蝶的后人站在我面前。热情地握了握手后,小潘从包里取出一张2007年1月27日发行的《联合早报》,报纸用半个版面刊登了一篇记者吴新慧女士专访我的文章,主标题为:中国心跳,副标题为:上海万张珍贵老照片曝光——包括周璇、阮玲玉、胡蝶等人的艺术照。

报纸上刊登了三幅明星照,第一张就是梳理一款刘海式发型、身穿一件黑白相间的绣花长裙、外戴一条白色真丝围巾、脚蹬一双尖头高跟皮鞋的胡蝶,她优雅地坐在一座小石桥的桥头石栏边,那神态和美感真是风情万种,艳丽迷人。这是一张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照片。小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为了让我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主动从大的皮夹子内取出了两张照片递给我看,一张是胡蝶与丈夫潘友声及小潘父亲潘家荣儿时的合影,另外一张是胡蝶与小潘父母的三人合影。我看了照片之后,对名人之后来到“王开”表示欢迎与尊重。小潘坐下后对我说:他在加拿大从事影视行业,因业务之需出差去了新加坡,并在当地发行的《联合早报》上看到“王开”档案室发现他祖母胡蝶的许多精美老照片,心里很激动,他原本打算在新加坡拍完电影直接乘飞机回加拿大温哥华的,就是因为想看看祖母年轻时在上海拍摄的老照片而临时改签机票飞到上海。当小潘看到报纸上刊登的胡蝶坐在苏州得月桥上的那张原照时,激动地说:“我祖母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她还专门放大一直挂在自己住的客厅里。这是她18岁时拍摄的外景生活照,真好看。”随后,小潘又拿起一张胡蝶半身的彩色照片(着色照),照片上的胡蝶身穿一件蓝色绣花的蝴蝶领旗袍,梳着一款刘海式发型,两耳戴着一对白色的珍珠耳环,脸上抹着胭脂口红,那种妍美真可谓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小潘爱不释手地拿着这张照片,兴奋地说:“这张照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从照片上看,她那时的年龄也就在17岁上下,真是太珍贵了。”小潘翻看着蝴蝶的一张张照片,不时地自言自语着“太好看了”“太难得了”“太珍贵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在上海看到自己祖母“原汁原味”的“真迹”老照片,他怎么能不激动！然而,当小潘看到最后一张他祖母胡蝶的照片时,目光仿佛被这张照片吸引住了,全神贯注:照片上的胡蝶身穿一件黑白相间的印花短袖背带裙子,脚穿一双白色尖头凉皮鞋,侧面坐在草坪上,双手撑在草地上,那神态自然优雅,面容纯情,质朴稚嫩,表情腼腆,一看便知这是花季时期的胡蝶。经考证,这是1924年胡蝶考入“中华电影学校”时拍摄的“试镜”照,时年她刚好16岁。

小潘看完祖母胡蝶的照片后,无限感慨且又意味深长地说道:“我能在上海祖母曾经拍摄照片的照相馆里看到她70多年前的原照,真是如梦游一般,令我感慨万千,不枉此行。”

冬雪 李海波 摄

马骏 书

朝花夕拾

赠吴君

袁松

吴君属虎,10月刚到龄退休。2007年夏,我因工作关系而与吴君结缘。吴君从外表上看不善言辞,但很注重工作上的细节,情感世界也很细腻。我认同吴君的善良与厚道,即便后来不常相见,但心中常有彼此。吴君接领退休证后便电话告知,我祝贺他“平安着陆”。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在我看来,到龄退休有着准点着陆、离场转场的基本含义。“退”,相对于入职进场来说,就是离职退场;入场时,由家(父母的家)走向社会;退场时,由社会回退至家(自己的家)。“休”,既要休身,更要休心。到龄退休,既不必伤感消极、无病呻吟,也不必做作矫情、心醉神迷。客观地说,退休也是得失相伴、利弊交织,虽说有点被动与无奈,但也是人生的阶段之一。乐天知命、顺其自然、淡然释怀方为真,利己、利人、利家、利社会。退休既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好,也不是“现实”里的那么惨,而是五味俱全、值得细品。人走茶凉是常态;人未走、茶已凉是世态炎凉;人走多时、茶未凉是个案与例外。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慨多了会伤心,感叹深了会伤神。

坦率地说,职场不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地方,但是能够给我们收入,买断了我们的青春。从人生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感激职场,然后从容地进出职场。如今退休了,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远离是非、慎独慎行。人生的上半场,为了家而不得不暂时地“弃家”;人生的下半场,特别是退岗、退休后,就该是为家而“弃职”了。否则,上半场的努力、奋斗、进取的价值意义何在？对家人的亏欠,理应尽力弥补,避免成为人生的遗憾！对父母是如此,对老伴是如此,对儿女也是如此。我们在职场上“人老珠黄”之时,在江湖上“不受欢迎”“不受待见”之时,在朋友只能“自顾自”之时,家人才是最可靠的“接盘侠”。妻儿接盘,容我栖息,亲情隆恩,宅家安好,欢度余生。

都说心态好很重要。殊不知,好心态从何而来？我觉得:好心态来自于我们真正地学会迁就、懂得妥协、善于和解。与现实和解、与实际和解、与自我和解,在尊重和承认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让“客观的我”与“主观的我”实现彼此接纳、相依共存。退休前,我们总是步履匆匆,对生命里、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情形没有精力去驻足察看、驻足体验、驻足感悟,以致错过、错失了许多。如今有了闲暇、闲情、闲心,就需抓住机会多多补课,扩大一点视野和认知。否则会抱憾终身的。闲而有趣、闲而有味、闲而有品才是精神上的富翁、人生里的赢家。

花甲之时,倘若还有爹娘的呼唤声、老伴的唠叨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儿孙的哭闹声、邻间的唠嗑声,是人生的幸福、快乐与祥和！对于黎民百姓、凡夫俗子而言,传承是人生基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接领前人传递过来的“接力棒”,紧握“接力棒”跑好“这一程”,完好交出“接力棒”目送喝彩“下一程”。因此,食人间烟火、过踏实日子,平凡一点、平庸一点、平实一点才是真实的。不断地把小日子过好,过得越来越好,就是最大的靠谱与着调。

退休了就不宜多留恋了。留恋多了不仅会伤身,还会伤神,有百害而无一利。崇明学宫有副楹联:学而明理进而知退,入则笃行出则友贤。它告诉我们:人生需要懂进退、懂出入、懂见贤思齐。余生要学会自甘平庸、学会居家过日子、学会三缄己口、学会自我和解,就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看客,在安静中实现自我和解。来时是孤独的,只有妈妈陪着护着;走时可能比来时更孤独,若有老伴陪着护着,那是福分;若有儿女陪着护着,那是意外;若有兄弟姊妹陪着护着,那是中彩。因此,从退休之日起,就要努力顺应清净、适应寂寞、享受独处。“偷偷地”活着,才是最高的境界。

谨与吴君共勉、共悟、共乐。

云间拾遗

辰山初级中学的前世今生

景青

1956年创办的辰山初级中学,是松江继一中、二中、三中和泗泾中学后的又一所中学。校址坐落在辰山小镇之南约百米处,占地30多亩,面北开门。

学校初创时,东部建有一座草顶大会堂,开学及毕业典礼,重要集会、讲座等都在这里举行,平时还兼做学生饭厅;中部建有3幢坐北朝南、加围廊的教室兼教师办公室、实验室,清一色的青砖黛瓦;西部建有教工宿舍以及厨房等设施,其中有些建筑都是当时学生勤工俭学的成果。

辰山初中招生的生源主要是佘山、天马和小昆山等地处松江西北部的小学毕业生。每届招生甲乙丙三个班级,学生数在150人左右。学校的师资由县教育局统一分配,主要是高师和中师毕业生,师资力量相对较强。我于1959年9月由当时的辰山中心小学考入这所中学,是该校的第四届毕业生,后又从该校考入松江二中。不少毕业生考入高一级学校后,经过三年刻苦学习后又相继考入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至今还记得前三届不少毕业生年龄相对较大,有的毕业生已达到服兵役的年龄。因此,经体检和政审合格的学生毕业时就直接应征入伍,其中有一位同学还当上了战斗机飞行员。参军入伍的同学戴上大红花,站在操场上接受全校师生的检阅,感到特别光荣。

当时的课程设置也与如今的学校相似,初一主课为语文、数学、外语(俄语),到初二增加一门物理,升入初三再加一门化学。副课有音乐、体育、美术,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生的课业负担普遍较轻,肩上的书包总是轻飘飘的,没有教辅材料,更没有家教,也没有多少课外作业。因此,除了物质生活比较清贫,那时的学生都生活得很快乐。

记得当时每周都开设劳动课,除了养猪养兔子,还有一片供学生学农的园地,我们将从书本上学到的有关知识运用于科学种田,种水稻、小麦和黄豆等农作物,都能收获很高的产量。因此每逢劳动课,学生的情绪都十分高涨。

至今还记得第一任校长是龚庆生,第二任校长是顾思浩,第三任校长是沈振明。沈蕴玉老师则长期担任教导主任,这位小个子女教师对学生特别严格,几乎所有学生都怕她。到了1969年,学校改名为辰山“五七”学校。学生数也逐年递增,高峰时达到千余人,教职工也由原来的30多人增加到近200人。记得当时有一批上海市区的年轻教师,都是师大和中师毕业生,来到辰山,支援农村教育事业。

上世纪60年代初,辰山初中聚集了一支十分专业也相当优秀的教师队伍。教育有方加上学生刻苦学习,教育质量处在了一个高光时期。尤其是数学教育质量不仅在全县,乃至在整个上海郊区都排得上号,被称为“上海郊区教育的一面红旗”。当时的《上海教育》《文汇报》等都刊发过专题报道,在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文革”结束后,辰山“五七”学校改名为佘山中学,学校也从辰山搬迁到陈坊桥,如今又改名为“松江区佘山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教学模式。

生活茶座

盛庆庆 书

■每周二、三、四、五出版 ■广告电话:021-37687187 ■投递热线:021-57814852 ■本报法律顾问: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潘峰:13512129634)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电话:021-37212888)